



以身许党的『英』『雄』夫妻

□ 红 梁



领导人之一。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又成为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骨干。妻子缪伯英，长沙县开慧镇飘峰山人，在开明父母和进步师长的引导下，成为了刚柔相济的新女性代表。

1919年7月，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北京，因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共同追求，缪伯英与何孟雄相识进而相知。他们一起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只坚持4个多月后就宣布解散，他们从工读互助的迷雾中觉醒过来，又从共同崇拜、敬仰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中得到启迪。他俩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起聆听李大钊、陈独秀的讲课；共同参加各种集会和讨论。随后，何孟雄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何孟雄介绍，缪伯英也加入到其中。研究会的频繁活动，共同的理想与追求，把何孟雄、缪伯英这对异性青年紧紧地连在一起。

1920年秋，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成立，何孟雄、缪伯英双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首批团员。11月，一批抱有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北京早期党组织成员退出，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李骏等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团员转入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刚满21岁的缪伯英是其中唯一的女性，也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在共同的理想信念引领下，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发动工人和妇女运动，撰写理论文章，为筹建全国党组织奋力工作。1921年的重阳节，何孟雄、缪伯英结为夫妇，被同志

们亲切地称为“英”“雄”夫妻。

“英”“雄”夫妻为党的工作到处奔波。1924年，张国焘被捕，供出了李大钊等一批共产党员名单。中共北京区委得知这一危急情况后，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转移，缪伯英得到党组织的通知后，立即决定转移回长沙老家。此时何孟雄因为工作过度劳累而身患重病，经常吐血。党组织决定让他跟缪伯英一同返回长沙治病休养。这年冬天，何孟雄和缪伯英一起回到长沙。半年以后，何孟雄就接到新通知，要赶回北京，这时，缪伯英已经怀孕，快要分娩了。离开丈夫的前夜，尚未完全恢复的丈夫和即将分娩的妻子内心满是对对方的担心，但更明白这是革命者必须要经历的，缪伯英叮嘱丈夫：“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团聚，你独身在外，无人照顾你的生活，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按时服药。”革命夫妻无奈分别两地，何孟雄离开长沙又奔向新的战斗，缪伯英以柔弱之躯在长沙坚守，领导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派遣何孟雄、缪伯英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工作。行前，深知上海工作危险的缪伯英把自己保存多年的照片、书刊和物品都留在了长沙的家中。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何孟雄则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位，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秘密工作，她化名廖慕群。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非常强大的地方，斗争环境十分险恶。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立即搬家。为了使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

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丈夫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工作中更是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

艰苦的斗争环境和艰辛的工作把缪伯英的身体拖垮了。一次，敌人抓捕何孟雄和缪伯英夫妇，为了掩护何孟雄，缪伯英把敌人引开，跳入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在里面躲藏了一个多小时。虽然躲过了敌人的追捕，却没能躲过病魔的侵袭。缪伯英患上了严重的伤寒，被送入上海仁济医院。看着病弱的妻子，何孟雄把7个月前托人从老家带来的一块腊肉悄悄拿了出来。夫妻俩平时从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给孩子吃，只用来宴请同志，现在拿出来做点腊肉油炒饭给缪伯英补充营养。可是长期缺乏营养而又过度劳累的缪伯英，连这点营养都没法吸收，无法阻止她生命的加速流逝。1929年10月的一天，弥留之际的缪伯英抓着丈夫的手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以身许党的缪伯英病逝时年仅30岁。

爱妻去世，伤心不已的何孟雄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投入到艰苦的斗争中，他与妻子一样战斗到生命的最后。1931年1月，在轰动全国的东方旅社事件中何孟雄被捕入狱。虽然身陷囹圄，但何孟雄仍然在狱中坚持斗争：他多次就中国革命的有关问题同难友进行讨论和研究；获知罗章龙另立中央，成立“非常委员会”，他当即表示反对，并请看守所的地下党组织转告他的意见：“我反对成立‘非常委员会’，我只主张党内斗争，坚决反对分裂。”对牺牲他早有思想准备：“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之事。”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无畏生死的英雄气概在他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和林育南、李求实等23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铁镣，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摘自2021年第6期《新湘评论》）

鲁迅编辑《海上述林》

□ 周惠斌

鲁迅与瞿秋白情谊深厚，曾书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相赠。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英勇就义。为了缅怀和纪念挚友，鲁迅决定集资编印瞿秋白的遗稿，并从他翻译的作品着手做起。

这年10月，鲁迅开始搜集、编辑、校对工作。一个月后，30余万字的《海上述林》上卷《辨林》编辑完成，主要收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高尔基等人关于文学的论文译文。鲁迅苦心孤诣，译者的署名用了3个英文字母“STR”，由瞿秋白笔名“史铁儿”拼音的3个字头组成；出版者则托名“诸夏怀霜社”，一是因为它从未存在过，也就无从查起；二是瞿秋白幼年曾使用“瞿霜”的名字，故蕴含“华夏人民怀念瞿秋白”的含义。鲁迅委托开明书店的章锡琛，在其管辖的美成印刷所秘密排版《海上述林》上卷。

1936年春，鲁迅的病情益加重，不时咳嗽、气喘和发低烧，但他仍强支病体，抱病编辑校对、设计封面、选择插图、挑选

纸张。3月下旬，鲁迅写完《〈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又亲自将印刷厂打好的纸型送到内山书店，再寄往东京印刷。鲁迅不无悲愤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与此同时，又开始编校《海上述林》下卷。

10月2日，鲁迅收到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后，欣慰地对许广平说：“这一本书，中国没有这样讲究地出版过，虽然是纪念‘何苦’（瞿秋白笔名），其实也是纪念我。”10月9日，鲁迅特意写了一则广告《介绍〈海上述林〉上卷》，对该书评价至高：“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高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10月19日凌晨，未等到《海上述林》下卷出版（1936年底才在日本印制完成），鲁迅因病去世。凝聚着鲁迅浓浓深情的瞿秋白译著《海上述林》，成为他生命中编辑的最后一部书。

（摘自2023年9月7日《人民政协报》）

陈毅与家人“约法三章”

□ 高中华

陈毅元帅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曾在1961年写就《示儿女》一诗，其中写道：“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

陈毅对亲属要求很严格，从来不准搞特殊化。1950年春，组织上把陈毅的父母和妹妹从四川老家接到上海来住。过了一段，陈毅督促妹妹自己去独立工作，并动员去报考学校。妹妹想上大学，请求哥哥写个条子或打个招呼。陈毅坚决不同意：“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我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上海市长嘛！你有本事自己去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后来，妹妹报考了卫校，被录取在上海市卫生人员训练班。

陈毅经常对干部说：“干部亲属的言行，在群众中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他自己非常注意对亲友们的教育，对他们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后来，陈毅的父母提出回老家生活，他提出三条具体的安排意见：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二、找普通民房住，不得向机关要房子；三、安家事宜自行解决。“约法三章”落实后，陈毅很满意。

陈毅还有另一首示儿诗，诗中写道：

“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力。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百病聋。少年当切戒，勿飞客里空。”他谆谆告诫子女要成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远大理想，莫要当纨绔子弟，“浪荡”一生。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陈毅的子女都非常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三儿子陈小鲁与粟裕的女儿结婚时，正好是夏天，前去家里祝贺的宾客看到桌上仅放着一个大西瓜，俭朴的“西瓜宴”就成了“婚宴”。在陈毅的影响下，子女们耳濡目染，养成了良好的品质，在生活上不仅克勤克俭，而且待人谦和。陈毅住院期间，子女们对医护人员都非常敬重，主动取药、打扫楼道卫生。良好的家风，不仅成为子女们终生的骄傲，也让他们终生获益。

（摘自2015年4月28日《人民日报》）



（上接1版）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开拓前进，演绎了一个个独立自主的精彩篇章。这里特别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一个经典实例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对打过长江去的战略决策。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发起后，解放战争的战局已显端倪。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学霸王”，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将革命停止下来、半途而废？这成为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的战局关系和影响着世界的政局、格局和走向。美国、苏联两个大国和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都在进行着深度谋划和深入观察。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指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8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个时候，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听取意见。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经周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先后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毛泽东

在会谈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他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2月8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听取了米高扬的汇报后认为，如果中国的内战继续打下去，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幼年的那个党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战火洗礼，已经发展壮大、已经成熟、已经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周密分析、深入研究，最后果断决策，“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人民解放军及时发起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半个中国，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今天我们回想这个决策，它是需要多么大的胆略和气魄啊！我们党对独立自主原则运用得多么好啊！假如当年我们党听取和采纳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建议，那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我们党都坚持了这一方针。值得一提的又一个经典实例是，毛泽东拒绝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第

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的同中国建立共同潜艇舰队和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建议。1958年上半年，赫鲁晓夫建议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后来又提出要在两国修一个不冻港，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断然予以拒绝。他认为，这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他言辞尖锐地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毛泽东的严肃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作解释。从7月31日到8月3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4次会议，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升级和两国关系走向紧张，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带来严重困难。国防尖端科技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陈毅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张爱萍对科技人员说：“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棒”。这形象地表达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坚强决心和坚定态度。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下，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走出困境，成功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曾讲到这件事，谈到它的重大意义时说：“如

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后来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們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站起；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也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在世界东方的巍然屹立。

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的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成功走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之后，又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我们正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

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所谓制裁，邓小平深刻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江泽民、胡锦涛也发表了许多类似的论述，强调了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就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就独立自主问题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强调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强调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强调独立自主的探索和

实践精神，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强调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强调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等。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创新和升华，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独立自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的品格和风骨，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我们党总结百年历史得出的“十个坚持”的经验之一。面对波谲云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必须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在发展道路上坚持独立自主，在理论创新上坚持独立自主，在经济的发展上坚持独立自主，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坚持独立自主，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坚持独立自主，在外交事务上坚持独立自主，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也是我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历史伟业的最高礼敬。